



汉语言文学专题研究系列

骆冬青 主编

词话理论研究

朱崇才 / 著





汉语言文学专题研究系列

骆冬青 主编

词话理论研究

朱崇才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话理论研究/朱崇才著;骆冬青主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6

(汉语言文学专题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101 - 07379 - 9

I. 词… II. ①朱…②骆… III. 词话(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 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1506 号

-
- | | |
|-------|---|
| 书 名 | 词话理论研究 |
| 著 者 | 朱崇才 |
| 丛 书 名 | 汉语言文学专题研究系列 |
| 主 编 | 骆冬青 |
| 责任编辑 | 刘淑丽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
| |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
| | http://www.zhbc.com.cn |
| |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
| |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
| | 印张 10 $\frac{3}{4}$ 插页 2 字数 240 千字 |
| 印 数 | 1—2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7379 - 9 |
| 定 价 | 28.00 元 |
-



总序

骆冬青

一位大科学家说：世界上第一个大学教授，肯定没有上过大学。

准此，亦可说，世界上第一所“大学”，肯定不在“大学”之中。

学者，觉也；大学，乃大智慧、大精神、大境界的象征，是追求真理、探寻价值的心灵，是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和终极之关切，是理念，是神圣，是永恒燃烧的活火！……而不是一种体制、一些场所，更不是学衔、学位、学历的授予地。“大学”之前的“大学”，是孔子、孟子、荀子，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等，等等，他们一个“人”就是一所“大学”，一所永远的“大学”。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一所“我的大学”，每个人都应当成立自己的“大学”。只要有求知意志、价值情怀与探索精神，只要崇尚真理、自由、境界，“大学”就不会死。心在，大学在。

大学是精神的修炼，是高深学问的探求，是白发的先生和青春的学生构成的最美丽的精神风景，是“我与你”在“同一个世界”中的“同一个梦想”！是升华的生命意志，是净化的性情气质，更是人类智慧的无穷求索。

当今之世，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面对信息的汪洋大海，传统大学的纸质为主的图书馆正在“宇宙流”一般的电子媒介前黯



然失色。人际交往的多种虚实相生的快捷方式,亦将改变传统大学的授受方式——我们都沦陷在“电大”之中。

这种严重的时刻,我们文科专业,更需切问大学何为?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其核心部分是语言、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以经典研读为重要内容,形成充实而又灵动的独特能力与智慧。但是,传统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在“电脑”天文数字的计算与传输速度面前,许多已经落后。大学,在传承知识的功能外,更应强调的是探索知识、研究知识、创造知识,是以知求识,“转识成智”,是把“集体记忆”化作“个体”的精神活水和智慧与创造之源;是在“知识”形成的“重演”与创造中,让人类天才的智慧化作人类的智慧与天才!是把“学问”变为动词,把“大学”变为“大学问”的创生地。

如此,每个大学教授都应当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学问”之道,有自己的盖世绝活与独到境界。大学中的“大师”,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都是一所大学。

大学课程中,最为重要的就应当是“专家”课,是“研究”课,是“专题”课,是最重要学术领域最新进展、最高境界成果的“活灵活现”的展示与交融。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名师出高徒”,正在于“名师”能将一切知识资源、精神资源化作研究的独到心得见解,并且形成新的知识、新的智慧、新的境界。其他学科当亦如此。

然而,汉语言文学各学科的丰厚积淀,与自然科学的“后来居上”不同,一切学问都需回到源始处。每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乃至学术思想,都有其“绝对高度”,不同时代之间,是高峰与高峰的关系,是绝顶之间的相视莫逆。因此,诸多研究领域,具有特别的专精与渊博的统一。专家与通人、高明者与沉潜者、“我注六经”者与“六经注我”者,在语言文学研究中各领风骚,都为求学者提供了思想风范和学术高格。竭泽而渔的文献学功夫,剖精析微的学术探求,灵性充盈的审美感悟,体大思精的理论思辨,在传统的义



理、考据、辞章基础上别辟的学术新境,自才、胆、识、力中形成的各不相同的学术精神……都在“专题研究”的专家课程中得到充分展示。

如此,在大学中“听课”,才是一种必须,才能成为精神的盛宴,才开辟了学术研究的种种路径,才通达由“有”到“无”、由“学”而“问”的神奇地带。

凝聚于这个系列中的,应当是我们推崇的大学精神,是知识与智慧之“问”,是心灵与精神之“觉”。活的课堂,乃是心与心的交融互动,是智慧与智慧的碰撞与激发,是研究过程的创造性重建,是新的学术灵光的闪耀与联翩……这些“可神遇而不可目视”的学术精魂,到了著作中是否还能与我们脉脉相通、心心相印呢?

纸上的课堂,尽管身不在现场,但却是一种更加自由、开放、永久的“在场”。古往今来的学者们,正是借此建构了人类永远的“大学”。我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仁,愿以微薄之力,在这个“大宇宙”中建造自己的“小世界”。

希望这个“小世界”能得长久。

2009年4月28日于金陵益疑斋



前言

词话研究,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词话文本研究、词话史研究、词话理论研究。本书着重第三方面即词话理论研究,前两方面因另有专书,本书尽量不再涉及。

词话文本研究,包括对于历代词话的搜集、钩沉、整理、汇编、考证、校勘等工作。先师唐圭璋教授编纂的《词话丛编》,为这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继《词话丛编》之后,笔者编纂的《词话丛编·续编》亦即将出版。除成卷的词话专著外,还有大量且极富理论价值、历史价值的词话资料,散见于各类典籍之中,亟需钩沉辑录,汇集成册。上述三部分内容,笔者已着手将其合编为《历代词话全编》,作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之一,将陆续分卷出版。在编纂过程中,笔者对词话文本进行了一些考证、校勘和研究工作,撰有《词话考》、《词话辞典》二稿。

词话史研究,就宏观来说,需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在充分研究词及词话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的基础上,理清历代词话的发展脉络,形成比较完整的词话发展观,力争忠实地再现词话发生发展的历史。就微观来说,需要在完整的历史发展观的基础上,对于词话的细微部分作比较细致的研究,特别是要从各条词话之



间的联系的角度,阐明有关词话资料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地位。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笔者有《词话史》一稿,已由中华书局 2006 年出版。

词话理论研究,则应从理论的高度,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出发,参考和吸收其他学科其他民族的理论特别是方法论精华,深入了解剖析历代词论家的主要观点、主要理论成就及不足,探讨其词学理论产生的背景和意义,为我们今天的词学研究特别是词作的研究欣赏提供有益的参考、借鉴。历代词话对于词学理论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在很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这些探讨涉及词的本质与起源、价值与功能、风格与流派、品格与境界、音律与格律、作家及作品、创作及技巧等许多理论问题。虽然古代的词话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有些观点及提法在今天看来甚至是片面的或错误的,但这些词话毕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词话家们对于词的理解、体会和研究,毕竟比今天的我们更为亲切、独到。而且,许多词论家本人也就是词作家,他们的词学研究可以说是现身说法,在很多方面都比现代人更为深刻,他们的历史影响更是现代人所无法取代的。因此,历代词话所表达、阐述或涉及的词学理论,是历代词话资料中富有价值的组成部分。本书即专门研究历代词话中的有关词学理论。

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作家及作品”、“创作及技巧”这两大部分涉及创作、接受、词人研究、词美学研究等专门论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词话中的词学理论”这一范围,因此,笔者拟另稿专门研究这两个论题,本书仅论述“本质——起源”、“价值——功能”、“风格——流派”、“品格——境界”、“音律——格律”这五个方面。



目 录

绪 论	1
一 词话的定义	1
二 词话的存在形式及主要内容	3
三 词话发展的基本矛盾	5
第一章 本质——起源论	9
第一节 词的本质:词是什么	10
第二节 词的本质规定	27
第三节 词的起源:时代与母体	38
第四节 词的起源:机制与过程	51
第五节 词的发展:历史与正变	65
第二章 价值——功能论	76
第一节 功能论:应歌、应制、应酬、应社	78
第二节 功能论:抒情、言志、寄托	96
第三节 价值论:矛盾价值观	116
第四节 价值论:矛盾的化解	129



第三章 风格——流派论	141
第一节 雅正与淫俗	144
第二节 婉约与豪放	170
第三节 词风与词派:宋金元	184
第四节 词风与词派:明清时期	192
第四章 品格——境界论	211
第一节 清空与质实	212
第二节 格与品	219
第三节 沉郁顿挫与重拙大	230
第四节 自然与浑成	237
第五节 境界	252
第五章 音律——格律论	265
第一节 协律论	267
第二节 声韵论	278
第三节 律谱论	290
后 记	309
附 录:参考及引用书目	314



绪论

词话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唐宋以来,先辈们不但为我们留下了数万首词作,而且为我们留下了近千万字的词话资料。词话研究是词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 词话的定义

“词话”一词,顾名思义,即关于或涉及“词”这一诗歌样式的“话语”(discourse)^①。作为一个词学专有名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词话”的含义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

在宋代,凡称“词话”者,一般都是指话词的专著,如《诗总》、《苕溪渔隐丛话》等文献曾称引的《古今词话》,《直斋书录解題》所称引的《晁无咎词话》等;但至少到南宋中后期,“词话”一词已经有了新的含义。宽永本《诗人玉屑》卷21所称引的“并系玉林黄昇叔旸中兴词话补遗”之所谓“中兴词话”,很可能并不是指黄昇

^① 话语,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单位的语段(text),通常限于指单个说话者传递信息的连续话语。参见[法]R·巴特《符号学美学》,第8页。



有一部叫做《中兴词话》的专著,而不过是指其《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之选词评词的“补遗”^①。另外,杂著笔记中独立成卷的话词之篇,似也可称为“词话”,如《浩然斋雅谈》卷中张枢条云:“出处已略载词话。”这里的所谓“词话”就是指《浩然斋雅谈》的下卷,这一卷是谈词的^②。到了元明时期,“词话”一词的含义又有了新的发展。许多属于《草堂诗余》系列的元明选本,多于书名或正文前题有“名贤词话”字样,如嘉靖十七年(1538),南京国子监监丞陈宗谟序本《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余》^③之所谓“词话”,已确定无疑是一种散见形式的“名贤”说词评词之“话”,而绝非是指某本话词的专著。有清以来,“词话”的含义更广而泛之,不但可以指称专著和自专著中所引录的片言只语,而且还可以指称自其他各类书籍中所辑辑的所有涉及词的话语。如康熙《御选历代诗余》所附“词话”十卷,就是辑自宋代以来子、史、集中各类书籍的“大杂烩”。近代词学也多以广义概念来理解、使用“词话”一词。如夏敬观《汇辑宋人词话》(广文书局1970年印行本)即辑自宋人笔记、小说、类书;唐圭璋师编辑的《词话丛编》,原拟分甲、乙两编,甲编收原本专著,乙编收经辑录而为专著者^④。

因此,我们可以把词话的定义按词学发展的历史实际所约定俗成的内涵及外延理解(而不是规定)为:语及词之话。即凡涉及词的话语,都是词话,而不论其是词学专著,还是散见于其他著作如笔记、别集、类书等材料,不论其是否曾作为“词话”被称引过,不论其价值大小(如果能分出大小的话),不论其是否有“词话”之名。就是说,凡是说及词的一段“话语”,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出

① 参见梅运生《中兴词话提要》,载自霍松林主编的《中国历代诗词曲论专著提要》,438页。

② 但此语或为《永乐大典》编者或《四库全书》馆臣之按语。

③ 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19,1607页。

④ 见《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200页。



现,也不管是什么内容,都算作是“词话”。

所谓“涉及词的话语”,包含了三个要素:其一,必须已经直接“涉及”。凡间接叙述词的环境、背景等材料而未提及词这一概念或直接叙述具体词作的,虽然可能很重要,但不能算是词话;其二,所涉及的必须是“词”。因此,如果仅是叙述某位词人生平、涉及某首词作的背景但没直接涉及词的创作、评论、本事等材料,不能算是词话;其三,必须是一段“话语”。如词谱、图谱、曲谱之书,系图表式,不是“话语”,因而不能归入词话,但其中如有一段段“话语”,如序跋、一段评述等,自可辑录归入;又如现代以来成章节之书,自有系统,并非条目式的一段话语,故也应排除。

二 词话的存在形式及主要内容

历代词话,按其存在形式,可分为词话专著和散见词话两大类。

词话专著,唐圭璋师《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收录85部,计4791页,约340万字。除此而外,尚有张绶《草堂诗余别录》、张星耀《词论》、徐钊《词苑丛谈》、裘廷桢《海棠秋馆词话》、郭则沄《清词玉屑》等80余部约350万字。

散见词话,主要有词籍序跋题记、单篇词学论文、言之成话的词作小序,以及诗话、笔记小说、别集、总集、类书中条目式的话词之语等等。

按具体内容,词话可分为本事、品评、引用、考证、论述等类别。

本事类词话。是词话较早的形态,如北宋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等。盖词之作,大多因事而起,其间又以风流韵事为主,士大夫公事之余,好以其词其事为谈资,有好事者辑录成帙,即为本事词话。此后的各家词话,记事、评点、论述,参差有之,但仍以本事为主。直至南宋末张炎《词源》,才有彻底摆脱记事窠臼,专门对



词的乐律、性质、作法进行系统理论探讨的词话专著出现。

品评类词话。其评点短而精,灵活多变,三言两语,指出对象的特色,给人以启发,是词话的一种重要形式。评点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常用方式,这一方式也在词话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北宋的散见词话,对于话及对象,时有简单的评语。南宋以后,点评的形式更是广泛运用于词话专著、词籍及其序跋之中。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1所列词集之下,便多是品评之语。黄昇《花庵词选》则多于词人词作之下,缀以长短不等之评语。评点词话一般附于词集的词作之下,后人偶有将其辑出单行者。徐钊《词苑丛谈》有“品藻”门,占全书十二卷中的三卷篇幅。品评类词话在清代更发展成为《词品》一类的“意象”式词评。

引用类词话。还有一类词话,本身并无本事,也无话词者的评语或考证,仅是叙说某书或某时有某词,一般还抄录词作,以供读者欣赏。这类词话以存词为主要目的,可称为引用类词话。这一类词话对于断代总集的汇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唐圭璋师《全宋词》、《全金元词》的辑录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即得力于此类词话。

考证类词话。宋代以文为本,文人地位高,于是形成以学问为尚的风气,考证之风波及词学,便有了许多考证类的词话。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曾季狸《艇斋诗话》等。明清之后,整理或刻印前代词籍,照例应有考证版本、文字、词人生平等内容,故明清词籍序跋题记中的考证很多。如毛晋刻印《宋六十名家词》时,就写有大量的这类考证文字。清代文人以朴学见长,其序跋中的考证更是连篇累牍。

论述类词话。这是词话中最具理论价值的部分。这类词话论及词的本质、起源、价值、功能、风格、流派、品格、境界、作家、作品、创作及技巧等一系列问题。其中有的是比较系统的理论专著,有的则是虽零散但有一定理论深度的话词之语。一般说来,宋金元



词籍的序跋题记较有理论色彩,大都可归入论述类词话。其中有许多序跋写得十分精彩,理论性很强。如宋王炎《双溪诗余自叙》、范开《稼轩词序》等。明清的词籍序跋题记也有较有理论色彩的。如明沈际飞的《诗余四集序》(《古今词统》卷首引)、陆以谦的《词林纪事序》等,就各自提出了较有特色的词学观点。至于陈维崧的《词选序》、汪森的《词综序》等,更是标志着词派成立的重要词学论文。不以序跋形式出现而可单独成篇的词学论文约在宋南渡前后开始出现,如李清照的《词论》等。宋末元初更有专以理论见长的词话专著如《词源》等问世。明清以来,特别是清代,以论述为主的词话专著极多,如按种数计算,有三十余部,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三 词话发展的基本矛盾

词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学体裁,是在晚唐五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登上文艺舞台的。受这一时期绮靡香艳文风的影响,同时,更重要的是,作为在前途莫测的政治生涯中追求及时行乐的士大夫们的一种工具,词从自立门户那天起,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世纪末”的病态色彩。在随后的北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政治上的重文臣抑武将,文化上的享乐政策,特别是输币纳绢政策所换来的相对安定的“国际”形势和士大夫们优裕的日常生活,“歌儿舞女”成为一种正当的政务活动或社交内容,于是词便日甚一日地流行起来。但是,词的流行并不代表词这一体裁的地位的提高。词作为一种追求欢乐的工具,一方面被它的主人所喜欢甚至偏爱,另一方面却仍然被它的主人看成是与唱词的妓女差不多或等价的玩艺儿,而被说成是“小词”、“艳科”。

北宋仁宗之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改革与振兴,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们的共识。范仲



淹、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词作,已出现了某种新的风格倾向。但是,以苏轼为代表的词坛新声并没有扭转词学界的精神面貌。不管北宋朝野如何腐败,不管北国铁蹄怎样跃跃欲试,从皇帝到士大夫,歌照唱,舞照跳,小词还写,小鬟还唤。北宋终于灭亡。南渡之后,文士们痛定思痛,认为小词亦不能辞其咎,于是对词的风格、功能和价值等一系列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复雅”这一纲领性的口号,就是作为社会中坚和发言人的士人对于词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的高度概括性的要求,同时也是种种社会矛盾在词学领域中的集中反映。

可是,不管复雅的呼声如何一浪高过一浪,小词仍然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南宋士大夫们在享乐方面丝毫不比北宋差,而在小词的淫艳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和文学理论,无论有着怎样的“弦歌而治”的光荣传统,却并不能决定社会的命运。即使文坛上都是一片“雅正”之声,也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政治军事问题。南宋也最终为北方落后的部落文化所征服。令人深思的是,作为一介文人,除了文化的武器,他们并没有其他方式报效君国。以张炎为代表的南宋遗民词学家,所提出的口号仍然是作为正统精英文化确证的“雅正”。

元代士人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其固守正统文化而不被异化的一大法宝,便是程朱理学。反映在社会文化生活上,他们极力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以此来规范文学(包括词和曲)与妇女,使得元代中后期的词话(主要是一些诗词集的序跋题记)带上了浓厚的理学味道。

明代政治腐败,文化衰落,社会生活中弥漫着淫、邪交织的毒雾。明代君臣既然公开以邪教与宣淫为己任,文人们如王世贞等人,“宁为大雅罪人”也要维护小词香艳风格的表白,就成为整个明代词坛的主流观点。

清代的社会政治环境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清代统治



者力图振兴,在政治文化上采取了许多开明措施;另一方面,统治者又害怕汉族文人的反抗或不合作,因而在笼络他们的同时,又采取了许多严厉的镇压或钳制措施。统治者对于程朱理学的提倡和对于科举考试制度的恢复,标志着他们最终承认了夏商周秦汉唐宋以来的正统文化,而汉族文人也不得不承认清朝统治者作为华夏文化代表者的资格。因而,清代的话词者,包括康熙和作为东南文士代表的朱彝尊,便有可能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取得对于雅正词学观的共识。但康熙的提倡风雅,不过是为了炫耀其文治,真正响应的人并不多,而朱彝尊的浙西派,则又流入清空一路,雅正再次成为空谈。清代中后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词坛淫、鄙、游词风的泛滥,复雅又成为词话的主导性理论倾向。同时,由于文网的森罗,词人们不可能自由地表达政治见解,于是比兴或寄托的方法便成为与雅正纲领相辅并行的词学方法论。

中国文化的主导方面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类型必然与以享乐和消费为原本特征的词体产生矛盾冲突。这一“消费性文体与伦理型文化”的矛盾,自始至终贯穿在词话发生发展的历程中,并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左右和影响着词话的发展方向。这一矛盾可以具体地体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如强烈的审美需求与保守的道德评价的对立统一,词人、词话作者所充当的政治家与文学家双重角色在其内心引起的矛盾,传统诗教与词作实际倾向之间的矛盾,词话作者的道德自律与其话词者角色之间的矛盾,等等。